

## 黔东南老苗文圣经翻译文本研究 以及“黑苗”属地的考证\*

——兼与王再兴先生商榷

王 贵 生

提 要：历史上黔东南老苗文圣经翻译文本的印制、传播，对苗族社会的发展变迁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但文献记载甚少。外界对于所涉及的有关背景，包括“黑苗”族群的分布知之不详，学界讨论存在不少含混、错讹。苗语圣经翻译文本以及相关史料的考证，同时结合实地调查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还原历史原貌。

王贵生，凯里学院民研中心教授，贵州省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题词：黔东南 老苗文 苗语圣经 黑苗

王再兴先生以《苗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sup>①</sup>为题撰文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苗语圣经翻译传播的历史”，考据丰富、论述严谨，为我们了解上一世纪初基督教在西南苗族地区传播，尤其是苗文编创以及圣经翻译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论述涉及近代贵州苗族社会一次重大的变革，其影响如苗族信教群体的形成以及注音字母老苗文圣经的习用传播及其所导致的苗族原始宗教的变革以及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裂变，等等，变革影响一直沿袭至今。不过王文当中个别细节可能还有待推敲，比如文中多次涉及到的圣经翻译文本流传范围以及“黑苗”分布属地等有关问题明显有误，其中有关圣经翻译文本的研究也还未展开。我们认为就此展开讨论，既可以是还原历史清本正源的学术需要，更重要的，还有全方位考察苗族社会历史演变的现实意义。

本文拟以王先生文中提到的胡致中 1928 年翻译出版的“圣经单行本”为据，根据文本内容的审读，同时结合近期实地考察的整理，追根溯源，拾遗补缺，希望能对基督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历史以及黔东南苗族的文化变迁做一些审订考证的工作。

王先生文中这样表述：“1928 年，在贵州盘海一带黑苗支系中开展传教工作的内地会传教士胡致中（M. H. Hutton）首次用汉语拼音字翻译出版了苗语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单行本。……汉语拼音字苗语圣经的传播影响比罗马拼音字苗语圣经的传播影响还要小，仅限于黔西南盘海一带的苗族教会，而且在普通史料中很难找到有关该地区教会兴旺发展的记载。”<sup>②</sup>其中对“黑苗”及其苗语圣经翻译文本的属地圈定在“盘海”以及“黔西南”，这是不对的。同文 210 页再次提到这一地名时的表述又变成了“黑苗是居住在贵州西南盘县一带的苗族一支。在访（该？）地区传教的基督教差会是中国内地会。1928 年，该会传教士胡致中翻译出版了黑苗语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单行本，使用汉语拼音字。”由“盘海”变成了“盘县”，前后不一，这显然是作者缺乏考证导致的含混。

王文提到的“1928 年，该会传教士胡致中翻译出版了黑苗语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单行本”<sup>③</sup>现仍流行于黔东南凯里、雷山一带的信教的农村地区，以注音字母刊印。该书同时刊有汉字、英文、苗文、罗马字四种文字的书名，分别刊印在封面、内封一、内封二和前言四处：

①封面：汉语书名——《苗族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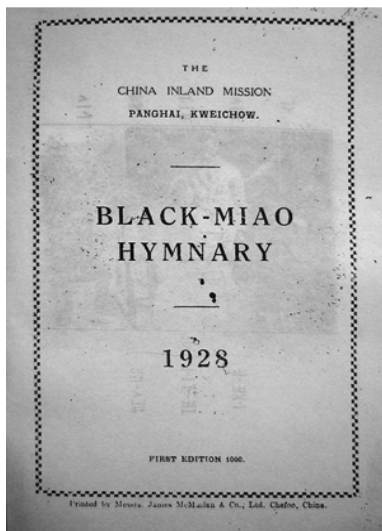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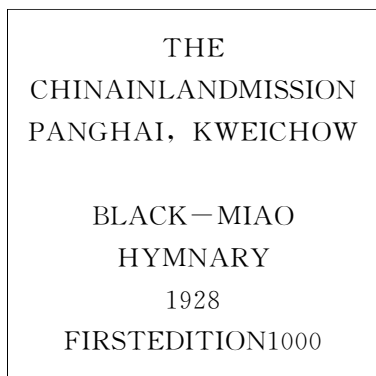
②内封一：苗语书名——《《丫—广又—し  
フマ—口フ万九—万秀フ|セフ》》

③内封二：英语书名——《BLACK—MIAO  
AOHYMNARY》

④《前言》：罗马字书名——《CaNeoLlei-  
DsanMeiVang—VaiBieSh’a》

封面为汉字标题，《苗族诗歌》是一种本土化的题名方式；内封一苗文和《前言》中罗马字，两个标题同为旁海苗语“嘎瑙谁赞美王外别匣”的译音，直译意为《黑苗赞美上帝的歌》；而内封二英文标题——《黑苗赞美诗（圣诗）》才是这本书标题的原始意义。

一、“盘海”地名的误读以及旁海教堂和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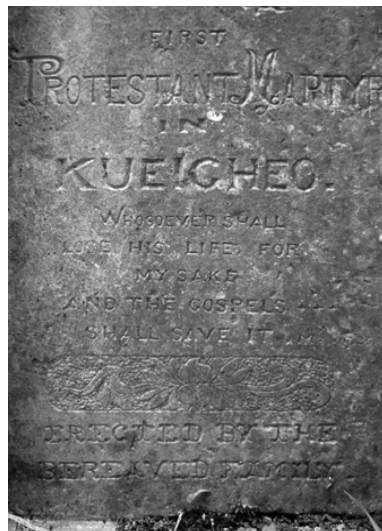
“盘海”这一地名显然是由《黑苗赞美诗》内封二英文的误读而来。（参图）

内封二英文大意为：中国内地会传教部，贵州旁海，《黑苗赞美诗》，1928年第一版1000册。

“PANGHAI, KWEICHOW”应该拼读为“贵州旁海”而不是“盘海（PANHAI）”。

“旁海”现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的一个镇，为黔东南苗族地区、清水江岸边一个重要的苗族聚居集镇。而贵州称“盘海”的地方至少笔者没有查到。另外，“盘县”在贵州西部，与云南毗邻，属于贵州省的六盘水特区，而非“黔西南”。严格意义的“黔西南”应为贵州省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全称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盘县”所在的六盘水属于苗语川滇黔方言区，与所谓“花苗”、“川苗”都在一个大的方言区内，属于其中的川黔滇次方言的范围内，而与“黑苗”所在的黔东南方言区根本不搭界，二者相距很远，两地苗族由于方言不同大多不能通话。

据贵州省宗教志编写办公室编《贵州宗教史料》介绍，外国传教士进入贵州是在十九世纪后期，最早于1877年到了贵阳，之后到安顺，具体到黔东南旁海的时间是1896年。当时定居旁海的澳大利亚籍传教士明鉴光（一写作明建光）是个历史事件中的人物，他于1896年到达旁海，后于1898年底为“避苗变”逃往贵阳，并在途中于重安江被当地哥老会成员许五斤击杀。当时清政府称此为“重安江教案”或“戊戌苗变”，而基督教人士因明鉴光系旁海传教士而称为“旁海教案”。有关史籍包括清代文档、《贵州省基督教史料选辑》以及《贵州通志》、《黄平县志》等当中多有记载。明鉴光死后葬在旁海猴场中寨内地会礼拜堂后，墓前有石碑，上载明鉴光被杀及安埋事宜<sup>①</sup>。旁海教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但明鉴光等人的墓葬以及墓碑至今还在，现为凯里市保护文物（见图）。



笔者专题开展实地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一本落款并加印章“凯里市平乐片区基督教会教务管理小组”的手抄本小册子，题名为《教会历史沿革变迁情况》，其中介绍：旁海教堂里的传教士，明鉴光之后还有：雍保贞（美国）——包辉（美国）——胡志忠（致中）（英国）——李亚伯（美国）——韩蔚忠（美国）。其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话：“1885（1896？笔者注）年，英国的胡志忠（致中，笔者注），他爱人叫胡师母（真实名不详），他们有个女儿胡小姐。当胡在镇远和旁海传教十多年以后，看到镇远有些人很穷苦，无房住的也来参加做礼拜，于是组织了基督教会的人去砌墙，搭成了简易房子给他们住。他又在旁海投资修建了一座福音堂，约有 375 米<sup>2</sup>的地面平方。在这期间也到雷山、西江和各地聚会点。1947 年他一家人就回国了。”

上述一段历史的线索在《黑苗赞美诗》书中也能找到，比如刊印在书中内封一后的两幅照片之一（参图）：



图上方的题词为注音字母老苗文：

く|△万旁々|せく|メ△γ

原文为从右往左排版，现改为从左往右书写，下同。拼读出来的句子为苗语，音译“亲外别求搭”，意思为：站着做仪式（肃立祷告）。

图下方题字为：

△メ→ふせく△マ、△|△虫△、虫△メ△

这是照片中人物姓名的介绍，依照中国国家谱模式按顺序排列，拼读出来为旁海口音的汉语方言“官话”，音译就是：

胡→德全、心珍、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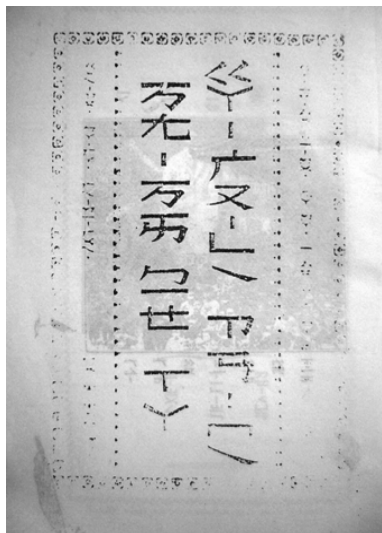
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的证据完全吻合。

## 二、《黑苗赞美诗》内封一苗文书名的解读

苗文书名的解读是我们至今所发现的最直接的确证之一。该书内封一（参图）苗文书名题写如下：

《γ-广ヌ-し△マ-△|△

万九一万旁々|せ△γ



原文为注音字母老苗文纵排，现改为横排，苗语音译“嘎瑙谁赞美王外别匣”，意译为：黑苗赞美上帝的歌。

这段话在该书的英文前言中还有同样的罗马字拟音“CaNeoLleiDsanMeiVang-VaiBieSh'a”。

“《γ-广ヌ-し△（嘎瑙谁）”为苗语，是一个生造的苗语特殊词组。“谁”意为“黑色”，“嘎瑙”则是凯里、雷山一带苗族的自称。苗族自称当中有“蒙、芒、牟、高熊”等多种不同，惟有黔东南凯里、雷山交界一带苗族才自称“嘎瑙”。但是，苗族自称只说“嘎瑙”，“嘎瑙谁”——“黑苗”则是当时，包括基督教传教士为区别不同苗族分支，按照传统文献生造的一个“新词”。以笔者涉猎所及，苗语自称“嘎瑙谁”这样的第一人称表达方式，以前从未听说，也从未在正式文献中见到过，苗族自己从来不用“嘎瑙谁（黑苗）”这一说法。

历史上苗族人民对于自己民族文字的缺失一直都是心头的痛，流传在苗语黔东南方言区的《苗族史诗·溯河西迁》说，苗族祖先迁徙过程来到“五条江水冲一处，九河汇作一江流”的南萝地方，不知怎样才能把文字带过河去，“急傻了的苗家人，文字用牙咬，咕噜吞下肚，才靠心头来



以及几个小型教堂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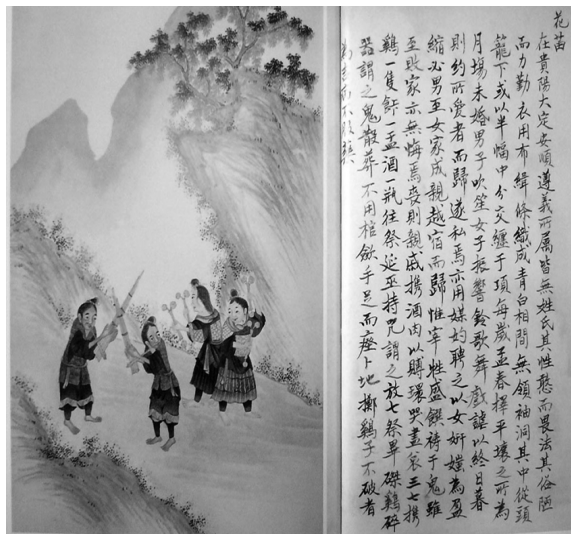
3. 书的《前言》用英语题写, 大意为书中圣诗选录、翻译、印刷的有关问题, 其中罗马字拟音的标题《CaNeoLleiDsaiMeiVang - VairBieSh'a》对应苗语标题《〈丫一广又一し一フマ一門一フ万九一万万ウ|セT丫〉》, 为我们保留了注音字母老苗文之前的罗马字老苗文的基本面貌。其中“CaNeoLlei”与“〈丫一广又一し一フ〉”(“嘎瑙谁”)对应, 无疑是对我们“黑苗”考订研究进一步的补充和肯定; 以下还有“旁海黑苗基督信徒”字样, 则是这一圣经文本的属地问题的明确说明。最后的落款题名为“M. H. HUTTON”, 我国近代文献一般音译简称“胡托”, 并将该书文字以及相关的注音字母苗文称为“胡托苗文”<sup>⑥</sup>

#### 四、历史上“黑苗”的分布范围

在涉及历史上苗族内部分支的问题上, 王再兴先生一文专门做过这样的讨论: “苗族是西南地区一个人口规模很大的少数民族。苗族居住区分布也很广, 又加上长期的历史变故, 所以各地苗族在语言、服饰和风俗习惯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支系族群。受基督教传播影响的西南地区苗族支系主要有花苗, 水西苗(川苗)和黑苗族群, 其中最主要的是花苗族群。”<sup>⑦</sup>其中“花苗”、“黑苗”的表述, 反映了基督教圣经翻译文本产生时代以及之前一个相当长时期重要的历史背景。

大致由明清以降, 外部世界较多地开始了对所谓“苗疆”内部少数民族分类的探究, 但认识一直都十分有限, 因为“居住在苗疆腹地的苗族, 既无土司, 又无流官统治, 交通闭塞, 与汉民很少接触, ‘苗则绝无统属, 有贫贱, 无富贵’。”<sup>⑧</sup>对于这样一个山高皇帝远、多民族杂居的世界, 人们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只停留在肤浅、直观的阶段, 对于其内部民族的传统分类标准十分混杂, 其中既有如清代陆次云《峒溪纤志》、黄元治《黔中杂记》等“惟衣裳颜色则各从其类”将苗族分为“黑苗”、“花苗”、“红苗”、“青苗”的, 又有如李宗昉《黔记》、田雯《黔书》以分布地域或不同特征分类的如“水西苗”、“川苗”以及“九名九姓苗”、“短裙苗”等, 还有以民族自称分类的如“喇家苗”, 甚至还将并非苗族的其他民族也囊括了进来, 比如

“侗苗”、“水苗”……笼统表达的时候则以“百苗”统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苗族自己内部本身大多没有这一类的称谓, 不少人甚至反感这样的称呼。但是, 在讨论那段特定历史的时候, 我们还必须依赖当时的文献记载, 包括文献中所采用的表述方式, 必须尊重当时的历史。



清嘉庆初年的《百苗图》记载, “黑苗”、“花苗”等都有各自不同的分布地域: “黑苗”(参图)“在都匀八寨(应为“八寨”, 笔者注)丹江镇远黎平清江古州族类甚众习俗各异衣服皆尚黑……”<sup>⑨</sup>, 分布范围概括得十分详细。上述地区大致说就是今天以凯里、雷山为中心的黔东南及其毗邻的苗族地区。

全国解放以后, 传统“百苗”之类的称谓逐渐淡出, 现代科学的表述方式一般是用不同苗语方言来划分苗族不同分支的, 主要有两个代表性方案<sup>⑩</sup>。早期的方案是将苗语分成了东部、中部、南部、西部、北部五大方言; 定型于 1985

年的《苗语简志》方案合并后定为“湘西方言区、黔东南方言区、川滇黔方言区”三大片区，原东部方言改称湘西方言、原中部方言改称黔东南方言、其余方言合并为川滇黔方言（以下包括七个次方言）<sup>⑩</sup>。历史上“都匀八寨丹江镇远黎平清江古州”一带即今天“黔东南方言区”（亦即早期的中部方言区）的所属范围。区域内的苗族今天一般简称为“黔东南苗族”，这一带的苗族“衣服皆尚黑”，以黑为美：“苗语中部方言对‘美’除‘好看’、‘好样子’等外，对最美丽事物加以赞叹时，却有一类似汉语‘美’的词，这就是‘青’。”<sup>⑪</sup>“苗族布料追求深色，这除了前面所说是追求蓝色的深化，追求智慧和时间凝结的劳动价值之外，还因为深色有一种厚重感。”<sup>⑫</sup>。这种审美意识与汉族早期亦以青为美同出一辙，“汉代人认为青是正色，九卿高官所佩绶带之色即为青色。”<sup>⑬</sup>黔东南苗族“衣服皆尚黑”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刻的内在底蕴。而“花苗”（参图）“在贵阳大定安顺遵义……”<sup>⑭</sup>一带，包括所谓“水西苗（川苗）”、“喇家人（Laka）”等均属川滇黔方言片区苗族分支，地理位置上与黔东南相距甚远，两支苗族包括口音乃至习俗也都相距甚远。

“百苗图”中与“黑苗”有关的还有“楼居黑苗”、“黑山苗”、“黑生苗”、“黑脚苗”、“黑楼苗”等，分布范围全都在上述“黑苗”题注所述“都匀八寨丹江镇远黎平清江古州”，也就是今天黔东南及毗邻地区的范围内，均与“黔西南”以及“盘县”或“盘海”无关。

“《马太福音》单行本”书名即采用了“黑苗”这一称谓，据此也可确定无疑地认为这本书就诞生在黔东南的范围内。

从实地调查的情况看，黔东南一带苗族信教民众人数比较少，但这一文化传承始终顽强地繁衍滋生，而且已衍生为苗族社会特立独行的一种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已经绵延了近一个世纪，经历了新、旧不同社会制度的时代变迁仍绵延不绝，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一种文字的创造及其流行，背后必然承载着丰富的政治、历史、民族、经济等人文信息，老苗文在民族文化演化变革过程中的作用，在与传统习俗相冲

突并逐渐渗透、替代民族原始宗教过程的作用，一种文化对于一个地区传统道德的影响和改造的过程，以及其在文化普及、传播过程中的积极影响等等，都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理性认识、正确引导的。虽然说，黔东南旁海教区和老苗文影响范围以及产生的影响在贵州苗族地区中最小，以至“在普通史料中很难找到有关该地区教会兴旺发展的记载。”<sup>⑮</sup>但也正因如此，可能才使我们对于这一地区文化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文化价值。正本清源，补缺察漏是我们开展苗族地区文化建设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工作。

（责任编辑：甘棠）

\* 该论文为教育部社科一般项目（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课题：10XJA740008 凯里学院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重大招标课题立项项目，课题号：yst200905。

- ① 王再兴：《苗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宗教学研究》，2008年1期第206页。
- ②③ 同上第209页、第210页。
- ④ 杜光炎：《重安江教案》，载《贵州宗教史料》，贵阳：贵州省宗教志编写办公室，1985，第1页。
- ⑤ 同①第208页。
- ⑥ 翁家烈主编：《贵州省志·民族志》，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 ⑦ 同①第207页。
- ⑧ 李庭桂等著：《苗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3页。
- ⑨ 杨庭硕罗康隆著：《百苗图抄本汇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106页。
- ⑩ 杨庭硕著：《人群代码的历时过程》，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 ⑪ 王辅世著：《苗语简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03页。
- ⑫ 张晓：《苗族审美意识初探》，载《苗侗文坛》，凯里，黔东南州文艺研究所编，1996年，3/4期合刊，第47页。
- ⑬ 张晓：《苗族审美意识初探·（续）》，载《苗侗文坛》凯里，黔东南州文艺研究所编，1997年，1/2期合刊，第88页。
- ⑭ 冯天渝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 ⑮ 同⑨第176页。
- ⑯ 同①209页。